[第一章 对现有日本汉诗史的回顾 2](#_Toc1636619979)

[第一节 《日本诗史》 3](#_Toc1701436277)

[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及其研究概况 3](#_Toc147264087)

[《日本诗史》的诗史观 5](#_Toc1166348865)

[《日本诗史》的本土意识 6](#_Toc594644239)

[本土意识的展开和成立：日中两百年和气运说 10](#_Toc1944315382)

[第二节 《日本汉诗史》 13](#_Toc1997452522)

[《日本汉诗史》概况 13](#_Toc1720167350)

[《日本汉诗史》的汉诗史观（1）：对“汉诗史”或“文学史”的自觉 14](#_Toc1427795536)

[《日本汉诗史》的汉诗史观（2）：尊皇思想 15](#_Toc977301974)

[第三节 《日本汉诗发展史》 18](#_Toc1559344762)

[《日本汉诗发展史》的汉诗史观 18](#_Toc16986946)

[日本汉诗史的发展动力 20](#_Toc2031760018)

[第四节 《近世东亚汉诗流变》 22](#_Toc653151579)

[《近世东亚汉诗流变》的汉诗史观 22](#_Toc1729668436)

[日本汉诗史的发展动力 23](#_Toc51274413)

[第五节 现有日本汉诗史对幕末明初日本汉诗转型的书写 25](#_Toc628116844)

第一章 对现有日本汉诗史的回顾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评述现有的日本汉诗史著作。在这一部分，选取了现有日本汉诗史的经典著作。它们分别是：江村北海的《日本诗史》、菅谷军次郎的《日本汉诗史》、肖瑞峰的《日本汉诗发展史》以及严明的《近世东亚汉诗流变》。

《日本诗史》是首部对日本汉诗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总结的著作。它阐述日本历代诗学的变迁，并注重对当时日本汉诗创作情况的总结。

《日本汉诗史》则是近代以来唯一一部以日本汉诗史为书写对象的专著。此书完整勾勒了日本汉诗自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与一般文学史大多仅包含作家、作品批评不同的是，此书着重构建了与日本汉诗发展有关的制度史。

中国的日本汉诗研究界虽然尚未有专门的日本汉诗通史著作出版，但在断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已经出现了两部重要的著作。《日本汉诗发展史》和《近世东亚汉诗流变》分别建构了王朝时代和近世日本的汉诗理论和实践脉络，呈现出日本汉诗史上两个重要时期的状况。

本章在评述以上日本汉诗史著作时，注重对两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什么是日本汉诗？日本汉诗发展动力和演进逻辑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反映出每个作者的日本汉诗史观。具体来说，第二个问题可以通过对每本著作的文本进行细读作具体的阐述；而相对而言，第一个问题，即对“什么是日本汉诗”这个问题的解答，可能并不会显明地出现在文本中。它需要以每本著作所采用的参照系作为起点观察。

最后，有关现有日本汉诗史著作的分期，将在第三章专门论述。

1. 《日本诗史》

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及其研究概况

江村北海（1713-1788），名绶，字君锡，号北海，通称传左卫门。其出身藩儒世家，长于诗文，是诗社赐杖唐的盟主。晚年在京都开设対梢馆，传授儒学。其著作有《日本诗史》五卷、《授业编》十卷、《北海诗钞》八卷、《北海文钞》三卷。

江村北海的《日本诗史》是日本第一部具有诗史性质的诗话著作。该书刊行于明和八年（1771年）。根据日本《国书总目录》，该书共五卷三册。唯一的写本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而版本则分别藏于国立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庆应大学图书馆。其中，该书的活字本可见于《日本儒林丛书》第三册和《日本诗话丛书》第一册。尽管有这些版本，但是该书在刊行后就没有再版。

《日本诗史》起稿于明和三年（1766年），成稿于明和五年（1768年）。原本计划出版十卷，但因为经费原因，只出版了现存世的五卷。据江户狂歌三大家之一大田南畝（1749-1823）记载，天明八年一月三十日（1788年3月7日）在京都发生的特大火灾中，《日本诗史》的原版被烧毁。

现存的五卷中，卷一阐述了日本诗学变迁的概略，时间从白凤时代（654年-710年）到庆长末年（1614年）的朝廷文学。卷二在时间上与卷一相同，内容分为十二个部分，分别论述武士、医生、隐者、僧侣、闺阁等诗作。卷三记载了元和元年（1615年）之后的文学情况。所记载的作品以京畿之地为创作中心，另有日本其他地方的文学。卷四同样记载了元和元年以后的江户文艺，以林凤冈（1645-1732）、木下顺庵（1621-1699）及其门徒为代表的诗作为中心。卷五顺承着第三、第四卷对京畿以外地方文学的记载。全书的重点在卷三及以后，也就是元和年之后的文学。

《日本诗史》在日本汉诗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体体现在：

一、它第一次系统总结了日本诗学变迁的情况，是日本江户时期汉诗学的代表作品。

二、它注重总结元和元年（1615年）起，即丰臣氏灭亡，日本长时段和平状态开始之后的日本汉诗创作情况，保留了当时相当多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江村北海在《日本诗史》以外又有《日本诗选》十卷补遗一卷，共七册。其中采集书目157种，除了别集以外，还有以幕末新出版为主的各种总集；而收录的诗人数量高达520人，其中收录5首以上的有75人。

三、其中提到的“日中时距两百年”、“气运”等概念，同时观照了日本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以及日本汉诗自身的发展和演进逻辑，具有相当的视野。

目前国内学界对《日本诗史》的研究并不完全。其中，《论〈诗薮〉对〈日本诗史〉的影响》一文详实考察了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在形式、内容和诗歌审美方面对明代胡应麟《诗薮》的继承。作者提出，《日本诗史》的特色之一，就是对中国传统史书体例的运用，呈现出《日本诗史》中对史学传统的自觉运用。此外，“气运”的诗学概念被江村北海用以解释日本汉诗的发展动因。同时，“气运”也被用以论述汉诗的功能、中日两国古典诗传统的关系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的重要问题。对《日本诗史》体例和“气运”说的分析，突出了《日本诗史》的诗史意识。

在诗史意识中，本文作者尤为强调江村北海提出的：日本汉诗发展与中国历代诗歌“二百年”的时间差的意义和对日本诗学界的影响。这是日本汉诗史书写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即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是两种不同历史时间中的产物。其中原因，固然有汉籍向域外传播和日本诗人阅读、接受汉籍之速度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两种不同的历史时间所隐含的前提是，日本汉诗自有其本体与演进逻辑。一些日本汉诗研究中的以中国古典诗歌为绝对参照系，单纯视日本汉诗为对中国古典诗歌模仿、接受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忽视了上述重要的前提。

如此，以两种不同的历史时间为构建日本汉诗史的前提，则会对另一个表述——“本土”产生影响。依照《近世东亚汉诗流变》一书的说法，近世汉诗人开始产生明确的本土意识，其创作也展现出鲜明的本土色彩[[1]](#footnote-1)。可以认为，此处的“本土”指的是有别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实践。那么，近世以前的汉诗创作如何？以日本汉诗为例，既然其与中国古典诗歌根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间，那么“本土”的时间和文脉显然是自日本汉诗发生起就存在，“本土意识”、“本土色彩”也并不是凭空出现和明确的。对“本土”的重新思考，或许可以为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特别是对早期日本汉诗的评价提供新的标准。

此外，格律声调的审美标准、风雅和日本传统“哀”美学的融合，对《日本诗史》这些方面的论述，则提示出日本汉诗史建构中的审美价值和经典选本的问题。什么风格的诗作能够代表日本汉诗的整体风格？江村北海的答案是：深郁厚笃、委婉细腻。那么，新的汉诗史的建构即要在更长的历史区间内作出新的解释。

《日本诗史》的诗史观

《日本诗史》开宗明义地规定了其题名“诗史”的涵义：

“ 是编论诗以及人，非传人以及诗，即巨儒学苟无篇章存在者，亦不论载焉。此所以名诗史之义。”（凡例）

江户时代在日本汉文学史上被称为“儒者文学的时代”[[2]](#footnote-2)。相对于十八世纪才出现的专门的诗人阶层，儒学者在江户时代之初就有着较为独立的地位。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大儒在京都的积极活动，以及时任将军家康不限制清原氏、中原氏两个明经家门以外的学者对经书进行加点、阐释，一些大儒的讲学遂招徕了许多倾心儒学的人士，到最后发展成为颇有影响的门派。

但《日本诗史》所透露的观念，并非盲随时风追捧大儒，而是以诗为纲目，突出了诗在诗史编撰中的中心地位。而这种书写上的尝试，除了和当时风气有所相对外，还体现了一种将文学和经学进行分离的努力。有学者总结过江户时代汉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经学和文学处在没有分化的状态，对汉文学的研究亦无法摆脱与经学的纠缠。《日本诗史》显然是逆潮流而行的特例。

这种观念体现在其书写中，则并不绝对因为某位人士诗才不足而不录其名。相反，江村北海采取的策略是，详录某人官职、世系，而后道其诗才不足。如评价平安中期的贵族和公卿：“文章博士为长，大学头在高。并有《水乡春望》七绝，俱非佳境。”[[3]](#footnote-3)、“庆滋保胤也。贺阳丰年也。朝野鹿取也。当时甚有声誉，而遗诗皆不满人意。菅野道真撰《续日本纪》，文才可想而诗殊不谐。”[[4]](#footnote-4)从这种“声誉-诗才”，甚至“文才-诗才”对立的结构中，可以看出《日本诗史》所具有的，对“诗”这一文体的自觉意识。

而这种自觉意识体现是诗史编撰者的独特眼光。不难看到，江村北海在《日本诗史》中所做的，并非简单对日本汉诗发展史的回顾，而是去发现，并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从以下评价中可以看到《日本诗史》对世间常识的批判：“内大臣实隆（三条西实隆），号逍遥院。因课子弟誊写六经及《史记》、《汉书》等，世知公为和歌巨擎。而不知有文学。故揭而出之。”[[5]](#footnote-5)

为何江村北海能够揭示常识以外的现象？上文提到，江户时代汉文学的研究和经学密不可分。而在这一时期，汉文历史，尤其是《本朝通鉴》、《大日本史》等正史的编撰也是日本汉文学史家考察的重要对象。这些历史文献的成立需要儒学者具备丰厚的历史学养，来对现有的文本进行整理和批判。此外，除了儒学者，这种以文本批评为核心的方法也被广泛运用到国学者的学问思考中间。因此可以认为，彼时日本社会中，具有汉文素养的学者对于文献中的历史性知识是有着较为自觉的追求的。

而这种自觉的追求，在《日本诗史》中有较多的例子。如：

“左卫门尉周光，《冬日山家即事》虽有小疵，自是胸臆中语，古平淡中反觉有味。史称周光宦仕不達。……余阅无题诗集。载周光诗多至百首。大抵山题咏，则史言诚是。”[[6]](#footnote-6)

“大伴池主有上已诗。见《万叶集》。大伴氏上有《观渤海》，贡使入朝七言律，见《凌云集》。渤海朝贡始未具见旧史。后辽太祖灭渤海，改为东丹国。以长子倍为东丹王。其地濒北海。明时名哈密者。”[[7]](#footnote-7)

可以看到，《日本诗史》的文献基础，除了历代诗家诗集，还有涵盖人物传记乃至地理等诸方面的历史材料。江村北海对这些材料的使用，除了对诗人生平、诗集作品，乃至诗作中所涉事件与历史作相互印证，证明其真实性外，也体现出当时儒学者综合性的汉文学养。

《日本诗史》的本土意识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诗史》中自觉的文献批判意识，但若细读文本对历史材料的运用，则能发现在这种意识背后的，对“我邦”的强调。

整部《日本诗史》，是经由“阿直岐、王仁来日献书”这一事件展开的。一般汉文学史，乃至汉学史的研究，都十分强调这两位渡来人在汉学传入日本时所起到的作用：首先，《周易》、《论语》、《孝经》等，构成了日本最早接触到的汉文经典，标志汉字开始系统传入日本；其次，自继体天皇开始，百济会定期献上五经博士，汉文化于是有了稳定的输入来源；此外，渡来人自此以后长期在朝廷担任史官或博士，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氏族。

那么，《日本诗史》是如何展开这一事件的呢？对阿直岐和王仁两位博士来日的时间，江村北海的记述和一般史书记载并无出入。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诗史》提到王仁在仁德天皇即位迁都之时，献上了所谓的《梅花颂》。江村北海认为这是“三十一言和歌”。

但同时，《日本诗史》亦记载了对于这段史料的质疑：王仁是外邦人，怎么可能会作和歌？“距今千有四百年，载籍罕传，其详不可寻而知也。”可见江村北海自己也认为这段史料过于久远，可信度不那么高。

然而，他仍旧采纳了这短短数语，并针对上面的质疑给出了自己的回应。他认为有两种可能：一、可能是当时的史臣翻译了王仁的意思，写成了和歌；二、王仁归化已久，已经熟悉了日本的语言，向别人学习，而后作了和歌。

这种做法和《日本诗史》正文中所体现的文献批判意识似乎有所出入。一方面，北海自己也不确定史料的来源是否可靠；另一方面，他将这模糊的史料放在了卷首——“献和歌”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事件，被归在了王仁的名下。

这种意识上的内在矛盾意味着什么？

从《日本诗史》引征的史料来看，江村北海并没有说明这三十一言和歌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首和歌。而其中所要传达的意义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在《日本诗史》所载文献的序列中，这篇和歌出现在日本最早一批输入的儒家经典之后，同时位于大友皇子所作五言四句的汉诗之前，说明日本的和汉文学在诞生之初并未出现显著的差距。另外一方面，作为渡来人的王仁献和歌于天皇，象征了渡来群体的归化，而归化的前提是：接受归化的这个民族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文化自觉。

接着看江村北海对于这段史料的回应。

一、可能是当时的史臣翻译了王仁的意思，写成了和歌。这首先意味着当时的和歌已有较为固定的体式，包括文字的形态、发音以及和歌的形式都有了一定的规范。其次，按照这种说法，王仁并非《梅花颂》的原作者，但江村北海依旧肯定了王仁在其中的作用。这说明王仁的功能很重要。按照本编的说法，他不仅是推动汉文化在日本上层传播的重要人物，更是第一个将和歌带到天皇面前的人——这意味着开启了和歌进入贵族文化的可能。

二、王仁归化已久，已经熟悉了日本的语言，向别人学习，而后作了和歌。这种理解除了如之前所述，证明了和歌在当时具备一定体式以外，还说明，在《日本诗史》对汉学传来这一事件的构建中，并非汉学的单方面输入、影响日本，还有和文化的反向作用。在这里，王仁这一符号，同时具备了汉学传播和受容日本本土文化的功能。

《日本诗史》中的“我邦”意识还表现在对人名、地名的命名规定上。凡例中提到：

“我邦多复姓，操觚之士，或以为不雅驯，于是往往减为单姓，不翅代北九十九姓，其义得失，姑置之。是编多完录姓氏，要使后人易捡索而亦不尽然者，又说也。余已载诸《授业编》，因不复赘。地名亦然，远江州称袁州，美浓州称襄阳，金泽为金陵，广岛为广陵之类，于义有害，是以一槩不书。”

日本人复姓改为单姓，有的是出于对典雅文辞的考虑。例如上文提到的平安时代的贵族庆滋保胤，就在《江谈钞》中被称为“庆保胤”；同时期的贵族大江以言则在其中被称为“江以言”。《江谈钞》是一部说话集，其记录了当时中纳言大江匡房的谈话，反映出平安时代贵族社会的不同侧面，因而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风气。从“是编多完录姓氏”的做法可以看出，江村北海是倾向保留原来的复姓的。只是由于改为单姓的做法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所以在此，北海对人名改动所造成的影响采取悬置的态度。

而在这段话中，针对时人用中国的地名取代日本令制国名的做法，江村北海的反对态度是很坚决的。《日本诗史》卷五所涉及到的令制国，以京都和江户为端点，主要集中在东海道区域；余下的令制国，最西端在山阳道的备后国，最南端是南海道的阿波国，最北端位于东山道的陆奥国，最东则延伸到常陆国。

而有关这些令制国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的知识，有的是江村北海从别人那里听说的，比如陆奥国：“陆奥大国，大小藩府，无虑二十，而仙台为大。余闻藩中以儒业世禄者，有数十人。而其文藻无所闻见。”[[8]](#footnote-8)但更多的是他从亲身的见闻中得出的，如在越中国的游历：“客岁之春，佐伯季雘游京数，过余家。闻余好山水，盛说立山奇绝，遂以秋九月，余游富山，并五十日。”[[9]](#footnote-9)又如其与各地好诗者的交往：“然客岁余游越中，高山人某，因富山渡边公庸，请诗于余。斯知其土人。”；“备中文艺，余未考之。近惣社邑人，藤野如水，游京师，数过余家。为人短小黑瘦，口讷讷焉。见之，如无才者。会晤再三，渐测其所蕴，殊为该博。”[[10]](#footnote-10)

从以上来看，《日本诗史》中充满了对京畿、江户以外的地方的关心。

《日本诗史》的“我邦”意识，亦体现在对日本汉诗与中国诗人、诗作之间关系的表述中。

卷二提到了两位日本僧人。释智藏曾在唐高宗武德年间前往中国，是第一个诗作见诸日本古代汉诗选集的僧人。但北海认为其诗“并无可采”。另一位僧人辨正也曾到过中国，受到唐玄宗赏识，并与盛唐诗人交往甚密。而其诗虽然受到盛唐诗人的润色，但北海认为“绝无可佳者。可谓空手自玉山还。”[[11]](#footnote-11)

这两位僧人从履历上看，可以说是日本僧人作诗的先驱者，但《日本诗史》对他们诗作的评价显然不高。而对于评价中所提到的，两位僧人共同的赴唐经历，北海的态度是暧昧的。尤其是辨正，说他“空手自玉山还”——北海一方面承认了盛唐诗的地位，另一方面否认了盛唐诗人润色过的辨正诗作的艺术价值，可见他并不赞同对盛唐诗的一味推崇。

除了王朝时代日本诗人前往中国学习以外，还有明末清初来日本避难的中国文人。《日本诗史》卷三记载了其中的双向互动。

据《日本诗史》，明朝人归化日本，又闻于诗者有元赟、朱舜水、林荣、何倩、顾卿和僧独立。其中，元赟的诗才最受北海赞扬，但也不过“间有佳者”。而林荣、何倩、顾卿的诗作“鄙俚最甚”。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诗史》在这一部分还提到了当时一位名叫大高坂季明的儒者与上述归化人的往来。对于大高坂季明，江村北海认为他“博览而有大志，最研理义”，给予肯定。林荣、何倩、顾卿三人对大高坂季明的诗，也赞赏称：“我辈来贵国，视数家文章，虽各有所长，然或未谐，章法句法，唯足下所作，尽合规矩。……足下文章，意深语简，韩柳欧苏无过。”[[12]](#footnote-12)但江村北海以为，这三人的话不过是吹捧，但季明信以为真，于是其诗“遂欠精细工夫”，其人“深惜为三人所误也”。

此处的叙事实际构建了两组人像。第一组是以大高坂季明为代表的，以汉土诗人的评价为唯一标杆的日本人。第二组是明末来日的中国诗人，无论是诗才还是论诗的眼光，都为北海所不屑。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从这里获悉北海对当时中国诗坛的看法，但他在后文中所提到“日中时距两百年”的差距，在这些归化的中国诗人身上已经无法体现。总而言之，在这段叙事中，迷信汉土的日本诗人终将误入歧途，而言过其实的渡来诗人则消弭了中国诗相对日本汉诗的优势。

本土意识的展开和成立：日中两百年和气运说

《日本诗史》对于“我邦”意识的展开，是通过“日中汉诗两百年时距”和“气运说”进行的。而这两个诗学现象的提出，显明了《日本诗史》的汉诗史观。

所谓“日中汉诗两百年时距”，指的是日本汉诗的发展较中国诗歌要滞后两百年。对这一规律的论述出现在《日本诗史》卷四：

余谓明诗之行于近时，气运使之也。请详论之。**夫诗，汉土声音也。**我邦人不学诗则矣已，苟学之也，不能不承顺汉土也。而诗体每随气运变迁，所谓三百篇，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自今观之，轶然相别。而当时作者，则不知其然。而然者，气运使之者，非耶。我邦与汉土相距万里，划以大海，是以气运每衰于彼。而后盛于此者，亦势所不免。其后于彼，大抵二百年。[[13]](#footnote-13)

以上这段论述中，江村北海回答了关乎汉诗史观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什么是诗？

“**夫诗，汉土声音也。**”北海认为，所谓诗，其源头在中国，是一种注重音韵的文体。可以看到，北海在论及诗的本质时，并没有明确汉土之诗与我邦之诗因环境不同而产生的区别。

二、诗的发展动力和演进逻辑是什么？

作为抽象概念的诗，自有其演进逻辑。诗三百是诗的源头，而诗在往后的每个阶段都呈现出皆然不同的风貌。在这里，北海提到了一个有关视角的问题。他认为，对于诗体的发展，处在某个阶段当时的作者大多是不知其然的，但如果拓展时距，诗体之间的差异也就一目了然。这种视角上的变化是通过时间的作用自然形成的。这意味着，对诗的演进逻辑的观察，并非由着论诗家的自觉就能够得到的。而从人的“不知其然”的状态中则可以看到，北海将诗的发展视作独立于人的历史的特殊运动——不是人知晓了诗的演进规律，而是诗呈现了阶段式的样态，为人所发现。

而气运是诗发展的动力所在。何为气运？北海对这一概念的运用是受到了胡应麟的启发[[14]](#footnote-14)。而细读《诗薮》原文，气运首先主导了诗歌体裁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势”和“时”的影响中[[15]](#footnote-15)；其次，气运决定了诗史的界分[[16]](#footnote-16)；此外，气运影响了诗人对诗才的运用，如刘禹锡和杜牧，“才皆不下盛唐，而其诗迥别”[[17]](#footnote-17)；最后，气运决定了诗的读者对经典的选择[[18]](#footnote-18)。可见，在胡应麟这里，气运全面渗透到诗的发展之中。

而江村北海虽然用气运解释了日本汉诗的滞后性，但也对气运自身的原理作了思考。从这思考中可以发现其论述的特殊之处。“我邦与汉土相距万里，划以大海，是以气运每衰于彼。而后盛于此者，亦势所不免。”在这里，江村北海将日本与中国之间客观存在的空间距离视为本国气运衰弱的原因。可见《日本诗史》对诗的发展动力的构建，并不全然以气运作为最基本的因素。在不可见的气运之上，显现的空间距离才是真正被强调的。

而这种显现的空间距离，并不仅仅存在于日本和中国之间，还存在于日本国内的各个地方之间。《日本诗史》有云：

“以余观之，清人篇咏，大抵诸家相似，其继整雅柔颇似于元季明初作家，较诸近时所谓明诗者，无剽窃雷同之病，而其气格则稍淡弱矣。当今京摄才髦所作，往往出于此途……而遐州远境，至今犹尸祝七子者。”

此处，京都和遐州远境之间诗风迥异的原因，亦在于地理方位的距离。所以北海才说：“气运推移，有本末，有迟速。”气运在运动中会受到制约。

三、日本汉诗和中国诗歌的关系如何？

如前所述，日本汉诗和中国诗歌在《日本诗史》中皆称为“诗”。而日中两国之间气运变迁，使得日本汉诗在发展时较中国滞后大约二百年。

《日本诗史》首先构建出一条“飞鸟（文武天皇）-弘仁（平安时期前期）-五山-元禄”的日本汉诗的线索。这种分期与近代日本汉诗研究者的写法不同。它并非是全然按照日本政治史或文化史的标准来进行的。与这条线索对应的中国诗歌史，则是依照“梁武帝天监元年-唐中宗嗣圣十四年（注释：原文是这样写的， 但实际上这一年号在唐中宗时期只存在了两个月）-宋元之际-明中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清”的关键节点展开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线索不是先有的中国诗歌史作为标准，而是恰好相反：日本汉诗发展的阶段性节点反过来构建了新的中国诗歌史。由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前文所述“滞后性”意味着什么。如果将“气运每衰于彼”视作一种贬义的价值判断，并将滞后等同于落后，那么这种写法和《日本诗史》中所呈现的“我邦”意识产生了矛盾。为了判明“其后于彼”的真正意思，重要的是看到江村北海所说的“而后盛于此者，亦势所不免。”也就是说，北海认为日本汉诗只是在成熟、兴盛的时机上后发于中国诗歌。发展时间上的先后并不能绝对地决定诗的优劣、高低。

那么，“我邦人不学诗则矣已，苟学之也，不能不承顺汉土也。”又作何解？“承顺汉土”是否与“我邦”意识冲突呢？此处首先和诗的本质有关——既然北海认为所谓诗就是汉土声音，那么这意味着日本汉诗人学诗，或“承顺汉土”，是为了在区别“我邦”与“汉土”的声音——因为语言不同，所以学诗是作诗的必要途径。

第二节 《日本汉诗史》

《日本汉诗史》概况

菅谷军次郎（？-1965）的《日本汉诗史》（大东出版社，1941）是日本第一部以“日本汉诗史”为题的专著。作者菅谷军次郎曾在太田中学校（今于茨城县常陆太田市）任教。之后在宫城学院女子大学担任讲师，关注唐宋文学及思想。在日本文部省主办的夏季讲习会上看到了与日本汉诗相关的讲义题目，于是便有了梳理日本汉诗之历史的想法。

本书撰写时所依照的材料，是以太田中学校的文库为基础的。值得注意的是，该校所在的茨城县，在明治维新废藩置县以前曾在水户藩的管辖范围内。关于水户藩，一方面它是当时重要的文教中心之一——弘道馆是幕末日本国内最大的藩校；另一方面，在水户藩形成的水户学，以儒学为中心，结合国学、神道等学问，既推动保留了数量可观的汉籍，又带有鲜明的尊皇思想。菅谷军次郎认为自己在太田中学校的执教，是“传皇学、授圣教”，其思想脉络也很明显了。

此外，在完成后，本书受到了当时知名的汉学家市村瓒次郎(1864-1947)的校阅。市村瓒次郎专攻东洋史学，以中国史的研究闻名。从术业专攻的角度看，他似乎不是校阅本书的最佳人选，但是考虑到其和水户学密切相关的家学渊源[[19]](#footnote-19)，菅谷军次郎的选择也并不让人意外。

本书叙述了奈良时代以前到明治时代，约一千二百四十年的日本汉诗的变迁沿革。本书对于汉诗发展的分期遵循日本历史的朝代分期。相较于江村北海的《日本诗史》着重介绍江户时期的汉诗创作情况，本书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日本汉诗的发展。特别是对明治时代日本汉诗的呈现了，弥补了近代日本汉诗史书写的空缺。

每一章的内容基本涉及四部分：和汉诗创作有关的风俗、诗风、音韵学与作诗法、主要作者和作品。

《日本汉诗史》的汉诗史观（1）：对“汉诗史”或“文学史”的自觉

《日本汉诗史》首先具有日本汉诗史的书写自觉。它对“日本汉诗史”这一文学史类别作了明确的定义。而这种定义，首先是通过和江村北海的《日本诗史》的比较得出的。

从本书的自序部分来看，作者菅谷军次郎接触过《日本诗史》。对于江村北海的著作，他的意见是：“它只能看作是日本诗话，不能够作为汉诗史构成、书写体裁的样板”[[20]](#footnote-20)。

菅谷军次郎的评价是不无道理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Literature）和人文学科是在幕末，由思想家西周（1829-1897）年自英国引进的[[21]](#footnote-21)，因此，在《日本诗史》编撰的年代，日本知识届并没有“文学”或“文学史”的概念，这部著作也不能被归入到作为文学史的汉诗史中。尽管从《日本诗史》的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江村北海对汉诗史中基本问题的解答，但在菅谷军次郎看来，北海并没有书写汉诗史的自觉。

此外，当时日本业已出版了许多日本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可见文学史书写已然形成了基本的范式。从当前可考的目录来看，日本史学者三上参次（1865-1939）的《日本文学史》（金港堂，1890）是第一部影响较大的日本文学史。而至《日本汉诗史》成书之前，至少有50部左右的日本文学史出版，期间亦不乏第一部用英语写作的日本文学史，由英国外交家阿斯顿（W.G.Aston，1841-1911）撰写。至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自十九世纪以来也有将近20部问世。

从以上近代日本的文学史出版概况来看，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最早的一批文学史大多作为高等学校文学科的讲义而印发的。因此，也可以认为，当时撰写文学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建设。此外，也有经由博士论文整理出版的学术论著。

菅谷军次郎又是如何对待这些文学史著作的？他举了冈田正之的《近江奈良朝的汉文学》以及《日本汉文学史》两本著作为例，认为学位论文和课堂讲稿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恐怕是因为这两种作品在书写时都兼带有文学史书写以外的目的。

可见，菅谷军次郎想要写作的，是“专门的”汉诗史[[22]](#footnote-22)。也正因此，他在本书开篇进行学术史的回顾时，以“至今以来的汉诗史研究和汉学的传来”为题，明确地将汉诗史作为研究和书写的对象。从他的回顾中可以看到，所谓专门的汉诗史，除了需要将诗人、诗作这些基本的材料按时间的顺序组织起来，还需要对与诗相关的背景进行论说。这也是为什么，这部《日本汉诗史》使用大量篇幅记载诗会、诗合等与汉诗创作有关的活动。加上作者在其中对诗风、汉诗评论、音韵学著作等不被过往研究重视的因素的深入研究，使得这些部分的比重超过了对某一阶段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介。综上，可以认为，《日本汉诗史》是一部“专门的汉诗史”，同时也是一部以汉诗为中心的文教制度、文艺理念的变迁史。

《日本汉诗史》的汉诗史观（2）：尊皇思想

《日本汉诗史》的汉诗史观，带有明显的尊皇思想。这种汉诗史观较之《日本诗史》的“我邦”色彩更进一步。如前所述，江村北海认为诗的本质是汉土声音，并没有与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作彻底分割。但到了菅谷军次郎这里，可以看到他试图在叙事中将中国对于日本汉诗，乃至日本汉学的影响边缘化。

以《日本汉诗史》对汉学传来这一事件的建构为例。作者认为，中国进入到这一事件中，要到日本推古天皇时期，也就是日本官方和向隋唐两朝正式派遣使者开始。在此之前，汉学的输出与受容，全以百济和日本为中心。然而，即使中日两国展开官方往来，中国仍然处于这段叙事的边缘地位。作者详录当时在朝廷中担任要职的百济人士姓名及官职。被称为“汉诗之祖”的大友皇子，也是受到了百济贵族沙宅绍明的指导，以至能写汉诗[[23]](#footnote-23)。同样认为大友皇子始作诗赋，江村北海只言“典重浑朴，为词坛鼻祖二无愧者也大友”。因此，对比《日本诗史》的写法，《日本汉诗史》在建构汉学传来这一事件时，采取的是突出百济的策略。

对于“什么是汉诗”这一问题的回答，《日本汉诗史》通过比较日中两国诗的起源作展开：

“汉诗兴起于皇室，是值得祝贺的。在中国，《擊壤歌》（老人作）、《康衢歌》（小童作），以及《尧戒》的‘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这些诗篇虽然被认为是中国诗的起源，但根据森槐南博士的考证，应当认为商颂五篇才是中国诗的源头。所谓商颂五篇，指的是《诗经》中的《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这些都是臣子作的诗。从这点来看，日本和中国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24]](#footnote-24)

在这里，菅谷军次郎区分了“诗”与“汉诗”。“汉诗”并非汉土声音，而专指皇室首先创作的一种韵文。而“诗”，可以指臣子之诗，也能指百姓在劳动时吟唱的歌谣，本来是一个中性的表述。对“汉诗”与“诗”的作者身份的标注，并非就两者的艺术价值作区分，而是意在突出万世一系的皇统。

对皇统的推崇也体现在《日本汉诗史》对汉诗功用的总结中。彼时是所谓皇纪二千六百年，即昭和15年（1940年）。在日本当局宣扬国威的一系列活动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宫崎市建造的八纮一宇塔。“八纮一宇”作为二战时期日本的国家格言，目的是为了动员国民。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诗的实用功能就被尤为强调。作者认为，幕末尊王攘夷的藩士藤田东湖、吉田松阴等人的诗可以激发国民的慷慨之气、忠诚之心；同时，军人的诗也有助于养成刚健的气质和义勇奉公的决心[[25]](#footnote-25)。尽管他反对将汉诗纯粹作为道德的教材，但从他的论述看，他并不反对，甚至乐见汉诗成为动员国家精神的意识形态工具。

《日本汉诗史》每章都会论述该时代的诗风。总的来说，其中所谓“诗风”包含了两个因素：该时代日本汉诗人所学习的范本；日本汉诗的体式。

日本汉诗人的学习对象从六朝、初唐诗，到《文选》、《白氏文集》、《三体诗》，再到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作。《日本汉诗史》并未详明其中变化的逻辑。我们只能从文本中对中日两国人员和书籍往来等线索中，看到一些外在的因素。例如明代的诗风在室町幕府时期就有影响，原因是五山诗僧和明朝的往来增多。又如江户汉诗人学习对象的多样化，是由于这一时期文教发达，引进中国的诗集较为容易。

日本汉诗的体式则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五言诗，包括排律和古诗是日本汉诗人最早熟练运用的体裁，而七言诗最早多局限在一些零散的俪句上，少成篇章；进入奈良朝以后，七言诗和绝句诗增多；平安时代是日本汉诗体式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一阶段除了杂言诗、回文诗、乐府等新体式之外，还出现了作为文字游戏的字训诗；第二个高潮则出现在江户时期，其间有诗余（词），更出现了用假名创作的诗——之所以仍认定其为汉诗，是因为它符合原先汉诗的押韵和节拍，只是根据日语和汉语的音节关系，将五言、七言扩充到十字和十四字。

如此，日本汉诗变革到江户时代，最甚者到了只保留韵律的地步。《日本汉诗史》总结日本汉诗史的演进道路时指出：汉诗有污隆，有盛衰，但总体上来说，走的是一条逐渐发达的道路。菅谷军次郎认为这是皇统的恩惠所致。然而正因为其尊皇观念贯穿始终，不能就此停止追问，否则会有将日本汉诗发展的内在动力过分简化的危险。

抱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将重新回顾《日本汉诗史》中的隐含线索。

文本强调了日本汉诗人所共有的精神特点：同化他国的文化物质，并发挥出新的特征。这里的“同化”和在当今的日本汉诗研究中广泛运用的“受容”具有相近的语义，但仍有不同。受容（じゅよう）的基本含义是：从他者处取得某物，并吸收。这里可以看到受容者的主动性，以及受容对象的异质性，两者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是同时被强调的。但本书中的“同化”，是强调主体性的同时，试图取消异质性。假名汉诗对汉诗形式中汉字核心地位的消解，就是取消异质性的一种尝试。

与“同化”模型相对的，概括日本文化接触异质文化方式的，还有一种“郊外”模型。日本古典文学专家古桥信孝认为，日本自平城京建立以来，就形成了所谓“郊外文化”。郊外文化的空间特征就是：没有明确的城墙对城内、城外进行区隔，而是通过郊外这一区域来连接二者[[26]](#footnote-26)。这种空间特征决定了日本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互动方式。首先，没有城墙的情况意味着内部的一方对外部文化采取开放态度，地理边界的消失同时对双方构成可能的向心力。其次，因为权力中心固定且辐射范围有限，作为缓冲区的郊外既是自然形成的，也是无力扩张的。在郊外，两种文化交互的结果是一种混合，而不是如“同化”模型那样带有侵略性质的取代。

由此可以认为，《日本汉诗史》视“同化”这一国民精神为日本汉诗发展的动力。而作为这一精神载体的日本汉诗人，他们的个性是无法泯灭的。正如菅谷军次郎在总结室町幕府的诗人派别时所指出的那样，不论是台阁，还是武士，抑或五山，这些只是概括，并不能遮蔽每个诗人的个人特质（167）。正因如此，体现了日本人特色和日本风格的“和臭”不应成为赏鉴汉诗的障碍，相反，它才是汉诗的趣味所在。

第三节 《日本汉诗发展史》

《日本汉诗发展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的日本汉诗史著作。作者肖瑞峰对日本汉诗的研究集中在王朝时代。总的来说，其关于日本汉诗的论述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唐朝诗坛，特别是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对王朝时代汉诗的影响；二是对王朝时代日本汉诗创作情况的微观研究，涉及宫廷诗会、总集和诗人；三是对王朝时代日本汉诗宏观发展历程的思考。而这些主题，均在《日本汉诗发展史》一书中作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

本书原计划书写从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的日本汉诗，最后只出版了以王朝时代为中心的第一卷。尽管没有形成诸如《日本汉诗史》那样的通史结构，本书还是在王朝时期的汉诗史展开之前，讨论了有关日本汉诗史的宏观问题，包括日本汉诗的发生、分期和各个时期的特点。

对于王朝时代汉诗的经典建构，本书分为两部分：日本汉诗总集、日本汉诗人。在汉诗总集的部分，以时代为序，作者分别论述《怀风藻》、敕撰三集以及敕撰三集后的汉诗总集各自的编撰背景、体例特色和艺术风格。在对日本汉诗人的评介中，作者以菅原道真为中心，兼及王朝时代的有名汉诗人，介绍他们的创作概况。

虽然本书的叙述以罗列、分类王朝时代汉诗总集为主，但也关注到了历朝汉诗总集在诗集的分类方式、诗作的主要形式和创作群体的变化，具体来说：

首先，诗集的分类方式从以诗人为纲目，到以诗歌内容进行门类的划分。

其次，诗集所收汉诗的主要形式  ，从五言诗到七言诗，加上长篇古体诗，篇幅上显现出明显的增容。而所收汉诗覆盖的题材也逐渐覆盖到社会生活的诸方面。

此外，从诗集的整体风格上看，创作游戏化的倾向愈发明显。

最后，从诗集所录作者来看，日本汉诗人的群体基本涵盖了统治阶级的各个方面。

《日本汉诗发展史》的汉诗史观

《日本汉诗发展史》注重从诗歌这一体裁观照汉诗在日本文学中的地位。与汉诗并行发展的和歌成为突出日本汉诗文学史地位的参照系。具体来说，日本汉诗从创作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影响了和歌的体式和歌论的发展（7-8）。

尽管作者认为，评价日本汉诗文学价值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汉诗是非汉语母语者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将中国诗歌作为参照系。但在行文中，中国诗歌的中心地位还是被强调。这和本书的研究对象，即日本王朝时代的日本汉诗有关。在这一日本汉诗史的发轫阶段，中国文学传统，乃至中国律令制度，对于日本国家的形成和文教的发展起到了全方位的影响。

而这种写法的问题在于，它只突出了中国文学、文化传统对日本输入所造成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这种写法并没有解决作者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在汉语音韵、声律极难掌握的情况下，当时的日本汉诗人还是对汉诗创作抱持着“近乎迷狂”（日本汉诗发展史，98）的热情？也就是说，强调中国文学、文化传统的单方面影响，是无法回答日本汉诗生成的动力问题的。

为了分析这一问题，就必须回到当时汉诗创作的现场，将汉诗的功能和作用从本书对“兴观群怨”这一诗学品格的追求中还原出来。而这一现场中，存在着一组矛盾，即国家仪礼的高度发达与发轫时期日本汉诗的稚拙表现。为什么当时的国家仪礼可以包容汉诗的生成、发展，而不是将其作为有碍宫廷颜面的存在加以遏制？

日本律令制国家成熟的仪礼制度，催生了以程式化语言为核心特征的汉文散文。而其中大部分文本又是直接服务于仪礼。可以说，早期日本汉文既在律令制国家的制度建设中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又同时作为文教制度的有机组成，发挥着宣扬宫廷威权的作用。

猪口笃志曾指出，最早在日本汉文学史留下位置的，是以圣德太子为中心生产的律令文本和佛教碑文，其中以佛像背铭为最多[[27]](#footnote-27)。

实际上，程式化语言被广泛使用在早期汉文中。其中又以律令制国家的仪礼文本为甚。《十七条宪法》中，“以和为贵”出自《论语·学而》、“笃敬三宝”、“惩恶劝善”典出《左传·成公十四年》等等，不一而足（十七条宪法原文出自日本通史，53）。这些源自儒佛经典的程式化语言的排列、重组，构筑起新的文本秩序。而在文本秩序的井然，乃至其中展现的风雅意味，则从属于一套似旧实新的仪礼话语——它源自中国统一王朝，而以天皇为唯一中心展开。

至于这套秩序的运作效果，陈旸的《乐书》有载隋朝使节出使日本的情况，从中可见其规模：

 倭国之俗，凡正朔大㑹，必陈仪仗，奏声乐，而五弦琴之器备有焉。隋炀帝常遣裴清使其国，彼乃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角歌舞而迎之。亦可谓不失尊王人之道矣[[28]](#footnote-28)。

那么，汉诗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同汉文一样，汉诗的创作活动也是新秩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宫廷诗会，我们还能够从释奠礼的细节中观察到仪礼秩序是如何操作汉诗创作的。若要在释奠礼中写出一首好诗，前提是要熟悉儒家经典。而儒家经典中提供了大量用于作诗的典故：释奠礼在大学寮进行。公卿参拜完毕后落座。此时由文章博士给出诗题。出题范围在《孝经》、《礼记》、《毛诗》、《尚书》、《论语》、《周易》、《左传》之内，每年选择一部。

然而， 作汉诗除了需要同作汉文那样长于用典，还要符合汉语的格律。由于两国语言存在着天然的差异，加之音韵学研究的完成，造成了早期日本汉诗后发于汉文的现象。正如《日本汉诗史》总结的那样：国文学的发展是韵文先于散文，而汉文学则是散文先于韵文[[29]](#footnote-29)。

用韵、平仄，这些对处于汉学传入阶段的日本汉诗人是很困难的：其一，因为古代日语的发音系统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中古汉语的影响，到平安时代才基本稳定，所以这期间日本尚未形成对音韵的完全认识。其二，传入到日本的中古汉语又分为两支，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也增加了日本人学习格律的难度：百济人输入日本的是当时南方的发音，称吴音；遣唐使听到的发音则以中国北方音为基础，称汉音。

而据《日本汉诗史》，直到镰仓幕府时期，日本僧人虎关才通过对《广韵》和《礼部韵略》的研究完成了《聚分韵略》[[30]](#footnote-30)。所以可以认为，日本的音韵学研究晚熟于日本汉诗的成规模创作，也是制约早期日本汉诗发展的重要因素。

日本汉诗史的发展动力

那么，日本汉诗史的发展动力是什么？总的来说，作者虽然按照日本汉诗自身的周期（发轫-嬗变-成熟-衰替），但有关日本汉诗史的发展动力，作者并没有超越以往日本汉诗史、日本汉文学史有关创作主体身份变化的线索。以下试分论之：

对于王朝时代日本汉诗的发展动力，作者认为，日本汉诗人对于中国诗的热情是最主要的因素；而外交场合的赋诗，更被视为关乎民族形象的行动，因此促生了日本汉诗人对诗艺的琢磨。与之相对的，当本国贵族知识分子对日本汉诗的探索意欲下降之后，王朝时代的汉诗创作就开始衰退。

到了五山时期，日本汉诗的创作主体从贵族公卿转变成了禅僧。对于这种转变，作者认为原因有二：第一，禅僧的宗教生活是以汉文佛经为中心的，因此，宗教生活中所形成的汉文素养是禅僧所以成为当时汉诗创作主体的重要基础；第二，禅僧承担了日中民间学问交流的角色，对中国诗风，特别是宋诗在日本的流行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五山汉诗发展到后期，也出现了衰颓之势。在作者的书写中，这种趋势背后的根源，依然在于诗人精神和创作风气的堕落。

从作者对王朝时代到五山时期的汉诗史发展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各个阶段汉诗创作主体的精神面貌和风尚决定了汉诗的兴盛与否。而有堕落就有纠偏。在作者看来，德川幕府对儒家思想的推崇正是出于对世风的补救。而这种思想文化的转型又推动日本汉诗创作主体由禅僧向儒者转变。

儒者的登场并不意味着整个日本汉诗史的演进动力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因为，不论是王朝时代的贵族公卿，还是五山时期的禅僧，抑或江户时代的儒者，他们能创作汉诗的原因在于他们有着相对其他群体更加深厚的汉文素养。也就是说，从贵族到禅僧再到儒者，汉诗创作主体身份的变化，其实际呈现的是以汉文为媒介的知识话语在历史中转移的线索。如此，江户时代后期以町人阶层为代表的日本汉诗创作的大众化倾向也能够得到解释。

然而，这一线索并不能够解释汉诗从经学中逐渐独立的趋势，也无法解释职业诗人的出现。因为单纯按照汉文知识素养的掌握程度来看，汉文知识在儒者群体中越是集中，汉诗和经学的关系就应该越紧密。但江户汉诗史所显露的趋势并不如此。

第四节 《近世东亚汉诗流变》

《近世东亚汉诗流变》（凤凰出版社，2018年）是中国日本汉诗研究中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世东亚各国汉诗的专著。该书以15世纪到19世纪作为比较研究的时间范围，意在突出东亚各国汉诗在中国诗学总结期影响下，以及各国汉诗创作之繁盛期的民族特色。

本书第二编“日本汉诗的近世流变”，可以视作是一部较为详尽的江户汉诗史。不论是日本汉诗人对本国诗史的总结，还是现代学者对日本汉诗研究的关注度来说，江户时代被普遍认为是日本汉诗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高峰。实际上，不仅仅是日本汉诗，在整个日本文艺史上，江户时代都被认为是“近世的文艺复兴”[[31]](#footnote-31)。所以，本书对近世日本汉诗史的书写，也是对日本汉诗史高峰期发展流变、艺术特色的一次总结。

《近世东亚汉诗流变》的汉诗史观

什么是汉诗？作者认为，汉诗之所以被称为“汉诗”，其核心在于作为其物质载体的汉字、汉语。具体来说，汉字重语义，因此汉诗的表意功能以词和词组为中介；同时，诗体形式的变化并不是重点，因此汉诗体式自唐大致定型后，就少有整体的突破（前言）。

由于本书是在东亚汉文化圈的背景下，对近世汉诗的创作情况、审美风格、诗学理念等情况作比较研究，因此，对汉诗之定义的考察得以在各国汉文学传统中进行。而在汉诗在东亚不同国家汉文学传统中的位置的基础上，日本汉诗自身的特色也能够凸显出来。

朝鲜汉诗是朝鲜汉文学中数量和艺术价值最突出的文体。而琉球汉诗发展时间较短，但从其发轫到被日本吞并期间，也诞生出不少有名的诗人、诗作。至于越南汉诗，其产生更被认为是越南古代名族文学发端的象征，见证着越南古代文学的历史。如此可以看出，汉诗不仅是东亚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各国汉文脉中有着不同的位置。

那么，日本汉诗在日本汉文学中又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同朝鲜、越南等民族的汉诗发展史相似的是，日本汉诗的发轫也是基于日中两国的往来。而在日本汉诗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诗学典籍的输入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中明清时期书籍的快速流通对近世日本汉诗的发展尤为重要。

而与周边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汉诗在日本汉文学传统中的位置却并非占据绝对主导的位置。菅谷军次郎就指出，日本汉文学的发展是散文先于韵文的。而纵观整个日本汉文学史，汉文的发展也是生命力与多样性并存，其数量和质量都并不逊色于汉诗：奈良平安时代的《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五山时期的四六文；一直到江户时期，出现了儒者的论述、《大日本史》的编撰、翻案传奇小说等等。

日本汉诗史的发展动力

和本章所评述的日本汉诗史著作不同，《近世东亚汉诗流变》一书的视角更为微观。作者考察的是近世日本汉诗史的发展动力。如前所述，近世是日本汉诗史的高峰。因此，近世日本汉诗史既是日本汉诗史整体的一部分，其演进符合日本汉诗史整体的趋势，同时，它又有着独属于这个时代的特色。

从近世日本汉诗史与日本汉诗史整体之关联来看，作者的书写关注到了江户时期日本汉诗创作主体的变化。从江户初期的儒者，到繁荣期以大阪为中心进行创作活动的町人阶层，近世日本汉诗的发展是以创作活动的大众化为线索进行的。可以认为，大众化的汉诗创作从整体上进一步推动了日本汉诗的多样性。相对地，作者也关注到町人文化对于汉诗诗风的负面影响。享乐和拜金的文化氛围对日本汉诗的精神产生了伤害[[32]](#footnote-32)。

以上，是作者以江户时代汉诗人身份的扩大为线索，对近世日本汉诗史的演进动力作出的阐释。而同时，作者从“诗坛领袖-诗社争鸣-诗人活动”三位一体的关系出发，更深入地探讨了江户汉诗各个阶段诗学转向的动力所在。总的来说，作者认为，诗坛领袖对某个诗风的倡导引领了同时段诗坛的风尚；而以诗坛领袖为中心组织的诗社之间产生的诗学争鸣，在推动了日本汉诗学论述走向成熟的同时，争鸣的结果也决定了当时诗风的走向；而汉诗团体中诗人个体在各地的活动，也扩散了某个诗风的影响。

具体来说，从诗坛领袖的影响来说，木下顺庵引领了江户初期的尊唐诗风，其弟子对其师门诗风的倡导进一步推动了当时汉诗的发展与创新。而此后，山本北山提倡性灵论，则是对此前尊唐诗风下，泥古模拟风气的反拨。

到这一阶段，以江湖社为代表的诗社活动，推动了近世日本诗风向性灵诗学的转向。而江湖社诗人的游历也对性灵诗学的推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3]](#footnote-33)。而诗社活动的影响力，除了诗社成员对汉诗创作、诗学理念探讨的热情以外，其根本因素在于诗社开创者对新诗风的推动。因此，可以认为，诗坛领袖、诗社活动和诗人个体的活动对于本书对近世日本汉诗史的动力书写来说，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因素。

至于作者所言近世日本汉诗的折衷期，广濑淡窗、广濑旭庄、梁川星岩这三位诗人被尤其突出。依作者所言，这三人“对江户后期诗坛的诗风诗论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加之他们门下弟子众多,在他们的倡导之下,折衷融合的诗作法成为江户后期诗坛的主流。”[[34]](#footnote-34)由此可见，在本书对近世日本汉诗史的书写中，诗坛领袖，抑或典范诗人的树立，是一条不变的主线。

第五节 现有日本汉诗史对幕末明初日本汉诗转型的书写

对于明治时代汉诗在日本汉诗中的位置，现有的日本汉诗史著作都一致地认为，这是日本汉诗衰微的时代。从江户到明治，日本汉诗史从高峰到式微，其原因为何？

菅谷军次郎《日本汉诗史》并未详述其中原因，但从他的叙述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对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在第八章“明治时代”的开篇只言，在这个“一切都改头换面的光辉灿烂的时代”，传统的和文、汉籍成为了西方文化的配角，不为人所重视，汉诗也因此衰微（日本汉诗史，351）。

和菅谷军次郎的叙述相比，中国的两部日本汉诗史对幕末明初的诗风转型原因的探求更为明确。

《日本汉诗发展史》强调，幕末的尊皇攘夷运动埋下了日本汉诗诗风转型的伏笔。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感时忧国的志士之作（71）。而尊皇攘夷运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西方国家在东亚地区的殖民扩张与日本发生的摩擦逐渐升级，如文化5年（1808年）英国军舰伪装成荷兰船只进入长崎港、文化8年（1811年）沙俄军舰舰长格罗宁在国后岛被拘捕等事件。日本和西方的冲突，使得汉诗成为日本民族志士抒怀的载体。

《近世东亚汉诗流变》也提到，德川幕府的腐败政治、日本和西方的军事摩擦，日本的国内矛盾最终在美国黑船的强力叩关下爆发（428）。幕末倒幕志士，以及明治初期诗人的汉诗创作，特别是七言绝句中体现的刚健之气和民族忧患意识成为了日本汉诗史发展到明治初年时的新主题。

可以看到，《日本汉诗发展史》和《近世东亚汉诗流变》都注意到幕末明初的风云巨变对日本汉诗诗风转向的影响。尽管在这两部汉诗史的书写中，作者在交代各个分期时代背景的同时，尽可能地突出日本汉诗发展的自律性因素和规律，但这种汉诗史观无法解释日本汉诗从高峰步入衰落的趋势。这意味着，日本汉诗史发展中的自律性动力在幕末明初失去了解释效力，使得日本汉诗史的书写者必须借助以尊皇攘夷运动为中心的

以尊皇攘夷运动为中心的一系列文学以外的事件，才能构建出一种从近世到近代日本汉诗史的合理逻辑。

如此我们可以认为，以尊皇攘夷运动为中心的事件，在现有日本汉诗史的书写中是特殊的。在它们的构建中，这一系列事件既是推动日本汉诗史的外部动因，又是汉诗这一文体自律发展的直接原因。而文教、世风、汉籍输入等因素对日本汉诗史的影响和这一事件相比，它们贯穿于日本汉诗史的始末，其特殊性就不如后者。

1. 严明：《近世东亚汉诗流变》. 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页 [↑](#footnote-ref-1)
2. 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东京：角川书店，1984 年，第231页 [↑](#footnote-ref-2)
3. 清水茂、揖斐高、大谷雅夫校注：《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第16页 [↑](#footnote-ref-3)
4. 同上，第21页 [↑](#footnote-ref-4)
5. 同上，第15页 [↑](#footnote-ref-5)
6. 清水茂、揖斐高、大谷雅夫校注：《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第14页 [↑](#footnote-ref-6)
7. 同上，第20页 [↑](#footnote-ref-7)
8. 清水茂、揖斐高、大谷雅夫校注：《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第52页 [↑](#footnote-ref-8)
9. 同上，第53页 [↑](#footnote-ref-9)
10. 同上，第56页 [↑](#footnote-ref-10)
11. 清水茂、揖斐高、大谷雅夫校注：《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第24页 [↑](#footnote-ref-11)
12. 同上，第31页 [↑](#footnote-ref-12)
13. 清水茂、揖斐高、大谷雅夫校注：《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第46页 [↑](#footnote-ref-13)
14. 胡欣,严明：《论〈诗薮〉对〈日本诗史〉的影响》.《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 第2期. [↑](#footnote-ref-14)
15. （明）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23页 [↑](#footnote-ref-15)
16. 同上，第59页 [↑](#footnote-ref-16)
17. （明）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82页 [↑](#footnote-ref-17)
18. 同上，第223页 [↑](#footnote-ref-18)
19. 李庆：《日本汉学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364页 [↑](#footnote-ref-19)
20. 菅谷軍次郎：《日本汉诗史》，大東出版社, 1941年，第1页 [↑](#footnote-ref-20)
21. 季羡林主编：《日本文学史 近古卷 下》.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4年，第657页 [↑](#footnote-ref-21)
22. 菅谷軍次郎：《日本汉诗史》，大東出版社, 1941年，第4页 [↑](#footnote-ref-22)
23. 菅谷軍次郎：《日本汉诗史》，大東出版社, 1941年，第6页 [↑](#footnote-ref-23)
24. 同上，第8页 [↑](#footnote-ref-24)
25. 菅谷軍次郎：《日本汉诗史》，大東出版社, 1941年，第451页 [↑](#footnote-ref-25)
26. 古桥信孝 著；徐凤，付秀梅译.：《阅读日本书系 日本文学史》.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334页 [↑](#footnote-ref-26)
27. 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东京：角川书店，1984 年，第40页 [↑](#footnote-ref-27)
28. （北宋）陈旸撰；张国强点校. 《乐书》点校 上下.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9年，第174卷 [↑](#footnote-ref-28)
29. 菅谷軍次郎：《日本汉诗史》，大東出版社, 1941年，第6页 [↑](#footnote-ref-29)
30. 同上，第145页 [↑](#footnote-ref-30)
31. 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东京：角川书店，1984 年，第231页 [↑](#footnote-ref-31)
32. 严明：《近世东亚汉诗流变》. 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385页 [↑](#footnote-ref-32)
33. 同上，第388页 [↑](#footnote-ref-33)
34. 严明：《近世东亚汉诗流变》. 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430页 [↑](#footnote-ref-34)